

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典藏版）

中国政区地理

刘君德 靳润成 周克瑜 编著



科学出版社

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典藏版)

中国政区地理

刘君德 靳润成 周克瑜 编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系《中国人文地理丛书》之一。全书共分上、中、下篇。上篇为概念与原理,主要论述了政区地理的研究对象、任务与内容,并系统阐述了政区各组成要素以及政区形成发展影响因素和政区划分依据原则。中篇为演变与发展,主要论述中国历代各级政区沿革及演变规律。下篇为改革与探索,主要论述了当代中国政区改革的各种新模式及不同类型政区改革的应用研究。

本书可作为人文地理、政治、经济、行政管理专业科技人员及师生参考使用,同时也可作为政府部门有关领导和管理干部的业务指导用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典藏版/吴传钧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4
ISBN 978-7-03-048209-9

I. ①中… II. ①吴… III. ①人文地理学—中国 IV. ①K9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94604 号

责任编辑:吴三保等/责任校对:刘小梅

责任印制:张 伟/封面设计:黄华斌 陈 敬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教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年4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7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0 1/4

字数:442 000

定价:3680.00元(共12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中国人文地理丛书》编辑委员会

学术顾问 胡焕庸 周立三 宋家泰 钱今昔

主 编 吴传钧

副主编 郭来喜 (常务) 王恩涌 许学强 陈寅寅

沈道齐 李润田 吴三保 黄效文 陈宗兴

邬翊光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希贤 王 铮 王兴中 王恩涌 刘 毅

刘君德 刘继胜 邬翊光 张文尝 张小林

张家楨 张绍飞 张耀光 许学强 陆大道

陆俊元 吴三保 吴传钧 吴楚材 吴建藩

李小建 李文彦 李润田 李振泉 陈 航

陈宗兴 沈伟烈 沈道齐 杨吾扬 邹逸麟

周一星 周尚意 周钜乾 金其铭 金学良

姚士谋 姚岁寒 郭来喜 郭焕成 黄效文

崔功豪 鲁 奇 谢香方 谢让志 彭 斌

蔡人群

学术秘书 陈 田 毕金初

《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序一

人文地理学是一门以地域为单元,研究人类活动和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经过长期的探索,人们认识到它的核心是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形成过程、结构特征和发展趋向规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把客观存在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作为整体,加以优化和调控的可能途径和对策,其目的是为了谋求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我国古代在很多哲学、史学和文学的作品中包含了人类活动和自然界相互关系的论述,认为人地关系既有和谐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这可以看作是人文地理思想的渊源。比较系统的论述则见诸历代的正史中的地理志、各类地方志和游记中,涉及面虽广,但零星而分散,又和其他学科交错在一起,因而古代人文地理学的个性是不明确的,只是知识和资料的积累过程。直到鸦片战争后,西方的近代人文地理学才随着其他科学技术开始传入中国,特别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通过外国学者、传教士和我国派往欧美的留学生而陆续引进。此后在大学中设置地理系,成立地理学会,并建立了专业的地理研究所,广泛开展近代人文地理学的传授和调查研究,但限于经费,工作规模小,出版成果少。

解放后,地理工作者得到了良好的工作条件,配合各项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但在初期的十多年中,国内各项工作都向原苏联学习,我国地理学基本上也按原苏联的模式来发展,引进了不少原苏联地理学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如农业区划、经济区划、地域生产综合体等,加快了我国人文地理学的现代化过程。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即三四十年代原苏联地理界在当时左的政治干预下,把人文地理学当作唯心主义“伪科学”加以全盘否定,以经济地理学取代人文地理学的观点也引入了我国,致使我国人文地理学中一度出现经济地理学“一花独放”,而其他一些分支学科被视为禁区的极其不平衡的状态。二则原苏联地理学强调发展二元论,把它肢解为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两门属性不同、互不联系的学科,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地理学的健康发展。

经过“十年浩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战略性的大转变,带来了科学的春天,使人们敢于从教条的、空洞的概念中解放出来,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地理学的理论和实际问题,重新评估和认识人文地理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自然环境和人文现象的地域差异性大,加之历史悠久而变化大,近年又处于改革阶段,在建设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多种多样的问题,这就为人文地理工作提供了广阔的研究领域。正因为如此,在我国发展人文地理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1980年初,中国地理学会因势利导,在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发出了复兴人文地理学的号召,并相应地成立了专业委员会来组织、推动、交流人文地理研究。原国家教育委员会也决定在各大学地理系中开设人文地理课程,个别大学还成立了专业的人文地理研究所,出版《人文地理》学术期刊,很多富有才华的中青年地理工作者踊跃投入到人文地理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之中。原先被冷落的一些人文地理分支学科,现在已成为热门;原先被视为禁区的一些分支,现在有人敢于钻研;一些尚无人问津的新学科,也有人开始探索。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国人文地理学确实已走上复兴、创新的道路。

今后的发展,总的目标是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地理学。这就要求联系我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实际,根据中国的国情特点,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和改革、开放、搞活的需要,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出现的一些具有明显地域性和综合性相结合的问题,主题是协调人类活动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并要求通过多方面的大量实践,逐步总结我国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配合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的各项人文地理研究工作取得的有效经验,系统建立我国人文地理学的理论体系。

已故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先生,生前曾主张要从五个方面来衡量一门学科是否成熟,即:一要有一大批高素质的专业科学家;二要有学科本身的理论体系;三要应用具有本门学科特点的方法;四要在为国民经济服务中发挥非其他学科所能替代的作用;五要有大量本门学科的成果资料的积累。这五方面的尺度是相互联系的,其中成果出版发行的数量和质量显然是最具体的衡量。

为了系统展示我国现代人文地理学的成就,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和科学出版社合作,计划组织人文地理学界合力编写一整套《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包括人文地理学及其主要分支学科,争取于近几年内陆续出版。这在学术上无疑是对中国人文地理研究的一个阶段总结;还可和 20 世纪 80 年代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自然地理》丛书相匹配,完善对中国地理的研究。甚望通过《中国人文地理丛书》的出版,把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

吴传钧

1993 年中秋

《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序二

新世纪迤降,纪元晋双千,地理学发展迈入多元多维结构的全息化时代。向为地理学研究的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化为众多学科关注的热点,既表征地理学研究对象的意义重大,又展示地理学在现代科学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和强大生命力。

若把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15与16世纪之交航海引起的地理大发现,视为地理研究空间的大拓展,为后来的工业革命激发了推动力,从而导致近代地理学的萌发,那么500年后的今天,人类进入可持续发展的新历史时期,航天地理学应运而生,“人地关系”将进一步演变为“人字关系”,可以预见21世纪中期,将会给人类带来意想不到的巨大效应。人类的“天地生人巨系统”观会赋予地理科学研究全新的内涵,无论是从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都将推动地理科学产生巨大的变革,不过人地关系仍将是研究的基础。

人文地理学是以研究人地关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及其变化规律和地域分异系统为基本宗旨。作为世界上最高智能动物群体的人类,从其诞生之时,就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人类的繁衍与发展既受人类社会形态与结构的支配,也受所处地理环境的影响与制约。有的学者把地理演化史分为天文时期、地文时期和人文时期,而人文地理学则是研究人文时期的人地系统,亦即研究各种人文现象的形成、演化、地域分异规律及其与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一门学科。

人地关系论(man-nature relationship)作为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基础,在古典地理著作中便有所论述。《山海经》、《尚书·禹贡》是先秦时期我国古典地理学发轫期的杰出代表作。战国时代,在百家争鸣中,对人地关系先后产生了早期的环境决定论、人定胜天思想、天人相关论以及因地制宜等不同流派。尽管后来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乃至唐代刘禹锡主张人地相关论等,对人文地理学发展都有重要贡献,但是在我国,由于长期受封建社会的束缚,从而阻碍了人文地理学成为一门真正的近代科学。

近代人文地理学萌生源于西方国家。德国地理学大师李特尔(Karl Ritter)堪称近代人文地理学的奠基者,他最早阐述人地关系和地理学的综合性和统一性,主张地理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应从观察出发,而不能从观念和假设出发,认为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布满人的地表空间,人是整个地理研究的核心和顶点。他在《地理学——地理对人类素质和历史的关系》(1822~1859)这一著作中,探讨了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的相互关系,把自然作为人文的基本原因,强调了自然界对人类历史的影响。

嗣后,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认定人是地理环境的产物,同时,又主张由于有人类因素,地理环境控制是有限的,并把位置、空间和界限作为支配人类分布和迁移的三组地理因素。其代表作《人类地理学》(1882,1891)、《政治地理学》(1897)、《生存空间:生物地理学》(1901)、《民族学》(1885,1886,1888)、《地球与生命:比较地理学》(1901,1902)等,对地理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被有的学者认为“是对人文地理有贡献者中最伟大的一位”。

19世纪后半期德、英、法、美、俄等国学者在阐述人地关系时,先后出现了“地理环境

决定论”(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以 F. 拉采尔、E. 森普尔(Ellen Churchill Semple)、E. 亨丁顿(Ellsworth Huntington)为代表;“二元论”(dualism)——以 O. 佩舍尔(Oscar Peschel)、F. 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和 A. 彭克(Albrecht Penck)为代表;“或然论”(possibilism)——以 P. 维达尔·白兰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白吕纳(Jean Brunhes)和 G. 弗勒(Herbert G. Fleur)为代表;“适应论”(adaptablism)——以 P. 罗士培(Percy Maude Roxby)为代表;“文化景观论”(cultural landscape theory)——以 O. 施吕特尔(Otto Schluter)、S. 帕萨尔格(Siegfried Passarge)和 C. 索尔(Carl Owtwin Sauer)为代表;“协调论”(adjustablism)又称“和谐论”(harmony)——以 B. A. 阿努钦(Всеволод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Анучин)、M. 怀斯(Michael John Wise)为代表。这些学术流派先后传播到中国,对近代人文地理学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不可忽视的是,自 16 世纪以来,西方列强殖民地不断扩大,伴随这种大扩展,一批批传教士来华,也带来不少新的地理知识。较著名的代表人物有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ui, 1552~1601)、艾儒略(Julius Aleni, 1582~1649)、龙华民(Nicolaus Longobardi, 1559~1654)、比利时人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 1623~1688)、法国人白晋(Joach Bouvet, 1656~1720)、杜德美(Petrus Jartoux, 1668~1720)、蒋友仁(Michael Benoist, 1715~1774)等。19 世纪以来还有不少西方学者来华考察,对中国地学(包括人文地理)有较大影响的代表人物有: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 1866~1952)、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n, 1870~1946)与德日进(Teilard de Chardin Pierre, 1882~1955)等。

20 世纪以来,中国地理学家也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开展了人文地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其中自然会受到西方人文地理学的影响。竺可桢先生作为中国地理学的一代宗师,既是近代中国地理学的奠基者,同时又是开拓人文地理研究的先驱。他的《地理与文化之关系》(1916)、《气候与人生及其他生物之关系》(1922)、《天时与战争之影响》(1923)、《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1926),是竺老早年对人地关系之论述。丁文江先生的《关于中国人文地理》(1923),张其昀先生的《中国人之传统》(1926)、《人地学论丛》(1932)、《中华民族之地理分布》(1935)、《论中国之人地关系》(1947),翁文灏先生的《中国地理区域及其人生意义》(1929)和《中国人口之分布与土地利用》(1932),胡焕庸先生的《江宁县之耕地与人口》(1934)、《中国人口之分布》(1935)、《安徽之人口密度与农业的区域》(1934),黄国璋先生的《政治地理学研究》(1941),李旭旦先生的《白龙江中游人生地理观察》(1941),王成组先生的《人生地理学的派别问题》(1941),周立三先生的《农业地理》(1942),吴传钧先生的《中国粮食地理》(1942),陈尔寿先生的《重庆都市地理》(1943),任美镠先生的《建设地理新论》(1946)等等,对人地关系研究和人文地理学建设均做出了重要贡献。

再以刊物为例,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前身——中国地理研究所主办的《地理》季刊,1942~1949 年共出 6 卷,发表论文 136 篇,其中人文地理学论文即有 56 篇,若把地理学通论、地理学思想史、区域地理、外国地理、地理教育等论文计入,则人文地理论文居于绝对优势,这种格局和国外地理学发展状况完全一致。

中国学者在介绍西方人文地理学名著方面也做了不懈的努力。20 世纪 30 年代初王海初先生翻译美国地理学家亨丁顿等所著《人文地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Human Geography),30 年代中任美镠、李旭旦先生翻译法国地理学家白吕纳的《人地学原理》(La

Geographie Humaina),陈健民先生翻译美国地理学家森普尔所著《地理环境之影响》(Influences of Geographic Environment),葛绥成先生翻译澳大利亚地理学家泰勒(Griffith Taylor)的《环境与人》(Environment and Race)(也译为《人种地理学》)等,在近代中国人文地理学发展史上起过不同的作用,特别是白吕纳的《人地学原理》所提出的人类在地球表面所做的事业按三纲六目人地学基本事实来阐述,并指明人类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反过来人类也可影响地理环境,影响程度随科技发展水平而异。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与作用是相互的,而人类居于主导地位的观点在中国影响十分深刻。

然而,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特殊政治环境造就“一边倒”和“学习苏联”的大气候,在地理学界,尽管对推动现代中国地理学,特别是自然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和地图学发展功不可没,可是对于人文地理学来说却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且是一场劫难。某些人把原苏联20世纪30~40年代非常时期的学派之争,生搬硬套强加于中国地理学界,且无限上纲,恣意扩大,以致把人文地理学赶出学术殿堂,这不能不说是一场历史悲剧!

记得1955年正当批判人文地理学高潮迭起之际,我在大学的一门必修课,称作“人文地理学批判”,它不是批判人文地理学的某种学术观点、思想和流派,而是批判这门学科,并给予全盘否定,满篇都是政治大帽子,诸如“唯心主义”、“资产阶级腐朽没落思想”、“为帝国主义服务”、“伪科学”等,在当时青年学子们纯洁的心目中,造成了“人文地理学”与“恶魔化形象”等同的极坏影响。这样,人文地理学在中国大地上便无立锥之地,被逐出地理学界。那时老师授课无讲义,更无教科书(也许奉命而教,违心讲授),我的笔录较详,还被一位报考留苏同窗借去参阅。嗣后我赴莫斯科大学学习,并没有感受到像国内那样剑拔弩张的学术氛围。实际上,当时原苏联地理界已在起变化,随即出版的《地理学的理论问题》导致原苏联统一地理学的复兴,出现了地理学的生态化,经济地理学的社会化,并以社会经济地理学的名义在原苏联恢复了人文地理学。

极“左”思潮在地理学界某些人群中泛滥,造就一些专门给人戴帽子、打棍子的“学术新贵”,直到中苏关系破裂若干年后还在肆虐,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被践踏和蹂躏。“文化大革命”中连经济地理学也不复存在,研究人员被迫改行。

1979年底至1980年初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地理学会第四届代表大会,堪称现代中国地理学发展的里程碑!300多位地理学家出席了这次规模空前的盛会,收到900多篇论文。许多著名科学家在大会上做了精彩的学术报告。对于人文地理学来说,李旭旦先生的《人地关系回顾与瞻望——兼论人文地理学的创新》和吴传钧先生的《地理学的昨天、今天与明天》(又名《地理学的特殊研究领域和今后任务》),揭开了我国复兴人文地理的序幕,迎来了人文地理学的春天!

李旭旦先生在报告中指出:“30年来我国自然地理学的各个部门都得到长足进展,但在人文地理学方面,则仅仅是一花独放,这个局面似应有所改变”。李先生进一步阐明:“人文地理包括经济地理、人口地理、聚落地理、民族地理、历史地理、文化地理、社会地理、疾病地理等,近年西方国家还出现感应地理、行为地理学科,内容极为丰富。人类除经济生活外还有政治生活、文化生活、文娱生活等方面。经济活动空间结构也不限于生产配置,还存在着物质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地区差异问题。因此,仅仅以研究生产配置为主旨的经济地理学虽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但是不足以概括人文地理学的全貌。”因此,李先生疾呼:“应该复兴全面的人文地理学。这决不意味着要恢复20世纪初期西方各

国的各种人文地理学流派,也不在于全盘照搬现今流行于西方的以福利为出发点的人生地理学,而是主张参考现代人生地理学的革新方向,运用新技术、新方法,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创立一门中国式的人文地理学,其内容应在正确的人地相关论基础上,分析研究如何按照自然规律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因地制宜地使自然为人类谋福利,而不受自然惩罚,把自然环境引向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物质文化水平的方向,研究在不同民族和文化区内的有关人文地理理论等。”

如果说在复兴人文地理学中,李旭旦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宣传家,那么,吴传钧先生则是一位卓有成效的组织家和实践家。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吴先生主持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经济地理研究室工作(20世纪80年代扩展为经济地理研究部),则在经济地理的大旗下,掩护发展了人文地理学的主要领域,除了工业地理、农业地理、交通运输地理外,还有人口地理、城市地理、历史地理、世界地理等,一个研究室竟有近60名研究人员,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吴传钧先生在广州会议上提出了“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指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大课题,地理学研究目标是协调人地关系,重点在于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优化落实到地区综合发展基础上,探求系统内各要素的相互作用及系统的整体行为与调控机理。其主要内容包括:①人地关系的形成过程、结构和发展趋向的理论;②各子系统相互作用强度的分析、潜力估算、后效评价与风险分析;③两大关系间相互作用和物质传递与转换的机理、功能、结构和整体调整的途径与对策;④地域的人口承载力分析;⑤根据一定地域人地系统的动态仿真模型以及系统内各要素间相互作用结构潜力,预测特定的地域系统演变趋势;⑥地域分异规律和地域类型分析;⑦不同层次、不同尺度的各种类型地区人地关系协调发展的优化调控模型。从而对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给出了明确的目标与研究方法,使人文地理研究得以升华。

我清晰地记得,李旭旦先生做完学术报告后,1980年元旦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郭敬辉先生召开敬老座谈会,出席会议的12位70岁以上的老地理学家(如今大多作古)中,有不少多年没有参加过全国性学术会议,出席广州盛会激动不已,座谈时说到伤心处声泪俱下,泣不成声。中国地理学会创始人之一的董绍良先生说:“我20年代就接触人地相关论,这次会上听大家谈人文地理学,我真像遇到久别的老友一样,我们要继承优良传统,为了繁荣人文地理学而勇于创新。”

然而就在会后不久,有着失落感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自命为“红线代表”的某位以批判他人出名的人物,在座谈会上做了肤浅应景式检讨和言不由衷的道歉后,竟又炮制新的“批判”大作,罗织罪名,妄图把复兴人文地理之举,当作“回流”、“复辟”、“新动向”,再度置人于死地,李旭旦先生首当其冲。《西北师范学院院刊》把李先生的复兴人文地理学的论文和“批判”文章同时刊登,更增添了对他的压力。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卷》委托李旭旦和吴传钧先生担任人文地理学分册主编,1981年冬在上海举行大百科条目研讨会,李先生忧心忡忡,此时,吴先生劝慰说:“难道您还怕戴第二次帽子?!时代不同了,不必理那一套!”

1982年2月胡乔木同志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作了要求领导干部学习人文地理的重要讲话,国家第六个五年计划特别把人文地理学列为要加强的薄弱学科之一,从最高层次支持人文地理学的复兴,使一度对人文地理持否定态度的“批判家”不得不偃旗息鼓,这不

能不说是人文地理学发展的历史性转折点!

为了适应人文地理学新发展,在吴传钧先生主持下,1981年5月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学专业委员会杭州会议决定成立人文地理研究筹备组,推举8位学者为成员,李旭旦先生任组长;1983年5月在南宁举行首次人文地理学术研讨会,吴传钧先生代表中国地理学会宣布,正式成立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研究组,李旭旦先生为组长。1984年3月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在南京举行第一次专业委员会会议。在吴传钧先生主持下,1984年7月教育部高教司和中国地理学会联合在北京举行人文地理讲习班,加速培养高校人文地理师资。之后中国地理学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教育学院又举办了几期人文地理师资培训班,使人文地理师资培训和科学普及成为全国性的活动。李旭旦先生作为首任专业委员会主任抱病参加了第一次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会议,做了“如何进一步开展人文地理学研究”的讲话。李先生强调复兴人文地理学不是复旧,要以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为准则,走正路,技术手段必须创新,论题内容要创新,要采取实地考察与社会调查方法来进行研究工作,向人文地理学领域的薄弱环节进军……。李先生因病没能出席人文地理讲习班,但他仍以教育家的智慧和极大的注意力关注这项活动。在张文奎、邬翊光、郭来喜协助下,他主编了《人文地理论丛》、《人文地理概说》两本论文集。

李旭旦先生的仙逝,是中国人文地理学界不可弥补的损失。他为之奋斗的未竟事业,在吴传钧先生直接领导下,由鲍觉民、张文奎先生主持的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做了不懈的努力,使人文地理学研究在教育得以蓬勃发展,学科理论建设和为国民经济主战场服务更上一层楼。鲍、张两先生的辞世,又一次使人文地理学界蒙受损失!

综观近14年来,我国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组织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985年6月与西安外国语学院合作,在西安举办的中美人文地理学术研讨会;同年11月在无锡召开的中英日城市地理学研讨会;1987年12月在深圳举行的人文地理学研讨会;1990年8月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地理联合会亚太会议;1990年11月与经济地理学专业委员会在上海共同举办的学术研讨会;1993年5月与沿海开放研究分会在昆明共同举办的沿海沿边开放学术研讨会;1996年11月与自然地理学专业委员会、经济地理学专业委员会在郑州联合举办的区域可持续发展学术研讨会;1997年6月与西安外国语学院共同举办的人文地理学与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1998年4月在北京与经济地理学专业委员会、城市地理学专业委员会联合举办的中国地理学与21世纪可持续发展研讨会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仅从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中分立出城市地理学专业委员会、旅游地理专业委员会,并举行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还成立了全国高校人文地理教育与研究会,也举办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使人文地理教学与研究空前活跃,人文地理已作为一门基础课程列入全国高校的必修课,有的大学把人文地理学建成了重点专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把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并列,设置了博士点、硕士点。

近10年来先后出版了《中美人文地理学术研讨会文集》(中英文版,1988)、《人文地理研究》(1989)、《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1997)等会议文集,吴传钧先生主编出版一套《人文地理学丛书》,创办了《人文地理》杂志(原名为《国外人文地理》)。一些学者还出版了不同版本的人文地理专著,如《中国人文地理》、《现代人文地理》、《理论人文地理》、《人文地理概念》、《人文地理学》,以及多版本的《人文地理词典》等,还有更多的分支学科专著先后出

版。一大批青年人文地理学家迅速成长起来并成为研究与教学的中坚,使中国人文地理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特别是以人地系统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世界共同关心而亟待解决的紧迫任务,人文地理学的基础学科和核心地位更凸现出来。

钱学森先生从人类认识世界的思想史出发,提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时,明确指出以研究地球表层为对象的地理科学的内容与方法。他高瞻远瞩地指明:“地理科学是一门学科体系,是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十大部门之一,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列。”“地理系统是开放复杂的巨系统”,要运用“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来研究。地理工作者要树立“地理哲学”思想,从事“地理建设”,从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应用技术三个层次来建设“地理科学”。黄秉维先生认为,钱学森先生所倡导的“地理科学不等于地理学,而是在若干科学基础上的改造、重组和发展”。

在 21 世纪来临之际,地理学,特别是人文地理学,要在继承优良传统基础上,充分运用空间技术、计算机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环境工程技术成果,从区域解释性描述和地理数据图表简式表述,向全球与区域的监测、规划、设计、调控、优化方向过渡,实现不同尺度地域系统的人地关系协调与可持续发展,逐步达到钱学森先生所期盼的“地理建设”和“地理科学”的前瞻性设想。

鉴于 20 世纪 70~80 年代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自然地理》(丛书),集中展现了新中国成立 30 多年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发展自然地理学及各主要分支学科方面的成就,如今编辑出版《中国人文地理丛书》,既是体现完整的中国地理学、全面评估中国地理建设成就的需要,也是为着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实现中国 21 世纪可持续发展所必需。

自 1992 年酝酿、策划出版《中国人文地理丛书》以来,先后在北京、昆明做了多次协商,又于 1996 年、1997 年、1998 年分别在开封、西安和北京召开三次丛书编辑委员会,集中讨论了丛书编辑的宗旨、书目、纲要、体例、结构、分工和进度,确立了精而准、系列化、中国化的撰稿原则。来自全国各地的 40 多位专家及其代表,一致表示争取在 1999 年完成本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作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迎接 21 世纪来临的献礼。

借此良机,我谨代表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和丛书编辑委员会,向为发展中国人文地理学做出贡献,参加丛书编辑出版,以及支持和赞助的各方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1998 年 2 月 22 日于北京中关村

前 言

“政区”是“行政区”或“行政区域”的简称,是指一个国家的地方行政机关所辖的区域。国家根据行政管理和建设、治理的需要,遵循有关法律规定,对领土进行合理的分级(层次)划分而形成的区域和地方,这就是“行政区划”,它是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政治地理现象。

行政区的地理研究应为我国人文地理学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这是因为:第一,我国是一个国土辽阔,人口众多,自然、社会经济条件差异大,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多民族国家,在我国极为丰富的历史文献中记载着各个历史时期政治区域的变迁,研究和总结政区变迁的特点和规律,对于丰富和发展人文地理学的内容有重要意义;第二,由于我国特殊的国体、政体环境,又处于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大变革时期,现行的行政区划体制在许多方面已不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地方行政管理的需要,必须有步骤地进行改革,因而现阶段加强政区地理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什么是政区地理学?简言之,它是研究国家的行政空间结构体系安排(行政区划)的一门科学,其基本矛盾关系为:在国家的领土范围内,政权建设,社会经济发展,国土规划、建设、治理与空间行政结构体系之间的矛盾。政区地理具有明显的人文地理科学的共同特性。如十分强调行政区的地理条件分析,行政区的空间地域结构特征,行政区的发展过程及地理环境结构与行政区发展相互作用的研究等。

在实际工作中,人们往往用“行政区划”,而不用“政区地理”。实际上二者就其本质内涵而言是一致的,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学科和任务的关系。行政区划是一项工作任务,政区地理是一门独立的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有其严密的学科理论体系。这正如同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区划的关系、自然地理学与自然区划的关系一样。

我国是世界上行政区划内容最丰富的国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的郡县制是我国行政区划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元代“行省”制度的建立,是我国行政区划史上又一次重大变革。我国城市型政区始于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十分重视行政区划工作,经过40多年的不断改革与调整,逐步形成了我国目前的行政区划结构体系。应当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区划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使行政区划体制适应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和城市化迅速推进的需要,坚持为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服务的方向,进行了许多探索,积累了有益的经验,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行政区划改革已成为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从我国政区地理的研究角度看,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古代,主要是关于政区沿革为主的著述,《汉书·地理志》开创了我国政区沿革地理研究的先河,我国现存的8000余种地方志都是以行政区划为单元编写的。近代,中国政区地理的研究以省区改革为重点,自鸦片战争以来至民国时期,直至解放前夕,省区重划及相关的国都问题一直成为我国当政者、学术界所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问题,发表论著颇多,许多观点至今仍具有

重要参考价值。

解放后,中国政区地理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禁区”走向开放繁荣的发展过程。1978年以来,尤其是1988年以来伴随着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的进展,政区地理的研究不断取得新成就。公开出版、发表的论著增多,地理学、历史学、政治学、行政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积极参与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应用研究。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于1990年5月经民政部批准成立的。90年代以来,民政部行政区划与地名管理司与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等开展了“中国设市预测与规划”,对中国未来一定时期内设市数量、空间布局及其排序进行了科学分析与规划;近几年来在民政部统一组织与布署下,许多省、自治区、直辖市积极开展了行政区划规划,取得可喜成果;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开展了江苏省苏(州)(无)锡常(州)地区和“三泰”地区(泰州、泰兴、泰县)、上海市浦东新区行政区划的战略研究。上海市和海南省行政区划规划等,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提出了行政区划改革的许多新观点新思路;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会先后数次召开了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出版的行政区划专著越来越多,较有代表的有《中国行政区划研究》(1991)、《中国行政区划概论》(1995)、《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1996)、《中外行政区划比较研究》(2002)等,为建立中国政区地理科学体系奠定了基础。

《中国政区地理》是一部全面系统介绍中国行政区划理论与实践的著作。作者试图从新的视角,用新的体系结构和最新的研究成果和资料进行分析、综合,以建立一个较为完整、科学的中国政区地理学学科体系。全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为“概念与原理”,中篇为“演变与发展”,下篇为“改革与探索”。在上篇“概念与原理”部分,首先探讨了政区概念,政区地理研究的对象、任务与内容及其理论基础;接着对政区的结构要素与类型,政区的规模与驻地,政区的建制与名称,政区的边界及其划分等进行了较详细的分析;最后对政区划分的依据与原则、政区的组织管理等进行了讨论。我们力图通过以上问题的讨论,初步构筑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政区地理学理论体系的框架。在中篇“演变与发展”部分,对中国古代、近、现代和当代的政区地理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述。它不仅使读者系统了解中国政区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各时期政区的特点,而且进一步加深读者对中国政区变迁规律的认识,同时对今后中国政区体制的改革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下篇“改革与探索”,大多是近几年我们在承担各类行政区划战略研究和咨询课题基础上的理论与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与概括。作者在对中国政区改革的理论认识与宏观思考进行综合概括的基础上,较系统地讨论了当今中国政区改革的几个热点问题,主要是省制、县乡政区、直辖市制、地县级市制及城市群区组织改革等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论述,提出了若干新的见解。最后对中国政区规划问题进行了介绍。相信这部分的内容将有助于广大读者从较深的层次思考中国未来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的走势。为了读者查阅方便,在本书的最后列出了中国行政区划的沿革简表、省级行政中心变迁、民族自治地方、设市城市简况及市辖区一览表。

本书的作者都是多年从事中国行政区划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专业科技工作者,承担过许多重要研究课题,其主要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全书由刘君德设计总框架,共分十八章,各章分工为:刘君德负责编写前言、上篇第一至第六章的全部及下篇的十三、十四、十五、十七章;靳润成负责编写中篇的第七至十章;周克瑜负责编写第十一、十二、十六、十八章。最后由刘君德审阅定稿。本书附录部分较多引自浦善新等《中国行政区划概论》一书中的图表;吴其宝参与了附录的编选、校核工作;附图由方晓和朱懿平清绘;一并致以深切谢

意。应当指出,中国行政区划的研究,尤其是作为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其理论研究尚处于开创阶段;行政区划的体制改革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经验与提高。正因为如此,书中值得商榷的地方一定不少;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行政区划改革又取得了新的进展、理论与实证研究不断深入但限于篇幅,在本次修订中难以全部反映。我们殷切地希望广大读者,尤其是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和实际工作者、专家、学者予以指正,共同为推进我国政区地理学的繁荣与发展作出贡献。

刘君德

1998年6月

于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

2007年1月于华东师大三村寓所修订

重印《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各卷的话

《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各卷自 1998 年开始先后出版以来,据《丛书》执行副主编,科学出版地理编辑室吴三保编审称:《丛书》已问世的十卷深受社会各界广大读者的欢迎,其中有些卷已销售一空。最近科学出版社领导有鉴于此,决定抓紧重印以应客观需求,拟借此机会适当更新书中主要数据,并补充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关重要实况,以更好满足读者需要。为此,希望《丛书》各卷主编能在一二个月内即提供更新稿备用。

考虑到定项任务的紧迫性,其中由我负责主编的《中国经济地理》卷,即就近与在京参加该书各章原来编撰同志磋商讨论,明确原书中各项统计数据以 1995 年为基础,尽可能根据 2006 年国家统计局所到 2005 年新统计;加以更新。至于近年我国经济重大发展情况:例如香港回归祖国后的新发展、长江三角洲中心城市上海修建了东海大桥和洋山深水新港、青藏铁路已从格尔木延长通达拉萨等都必须补充入新书。此外并商定了有关同志的分工:刘彦随(负责第 4、12、20、22 章)、汤建中(第 3 章)、李文彦(第 5 章)、陆大道(第 6 章)、张文尝(第 7 章)、顾朝林(第 8 章)、毛汉英(第 11 章),其余第 1、2、9、10、13、14、15、16、17、18、19、21 章由主编负责适当更新补充。至于《丛书》已出版其他各卷,也由各卷主编分别组织力量,根据更新数据和补充重要新发展情况的要求进行加工。我相信通过这次加工,重印后的新书无疑将呈现一些新貌,但更彻底的更新改版工作则将有待于若干年后更进一步的努力来实现。这也是参加《丛书》编写同志们的共同愿望,在此向读者们首要倾诉一下。

吴传钧

2007 年初

目 录

《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序一	(i)
《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序二	(iii)
前言	(ix)
重印《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各卷的话	(xiii)

上篇 概念与原理

第一章 政区概述	(3)
第一节 “政区”与“行政区划”	(3)
第二节 政区的基本特征	(4)
第三节 政区的类型划分	(5)
第四节 政区的意义与作用	(7)
第二章 政区地理研究	(10)
第一节 行政区划与政区地理	(10)
第二节 政区地理的研究对象	(11)
第三节 政区地理的科学性质	(12)
第四节 中国政区地理研究的任务与重点	(13)
第五节 中国政区的发展与研究概述	(16)
第三章 政区的理论基础	(23)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理论	(23)
第二节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原理	(24)
第三节 行政区与经济区关系原理	(25)
第四节 行政区经济原理	(26)
第五节 层次与幅度关系原理	(27)
第六节 其他学科的相关理论与原理	(28)
第四章 政区要素分析	(31)
第一节 政区的要素结构	(31)
第二节 政区的规模	(32)
第三节 政区的等级	(34)
第四节 政区的行政中心	(35)
第五节 政区的名称	(38)
第六节 政区的边界线	(41)
第七节 政区的区位与形态	(43)
第五章 政区的影响因素与划分原则	(47)